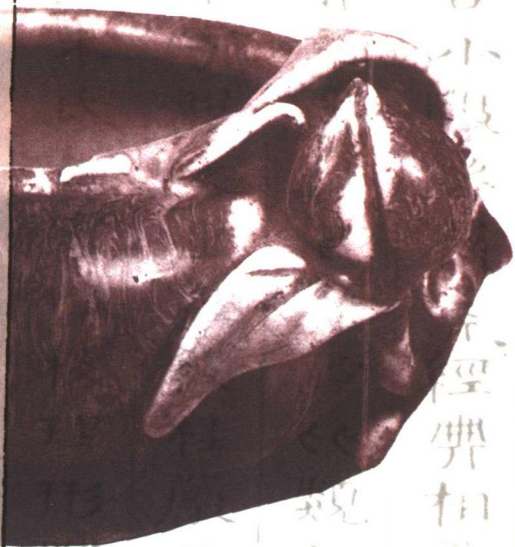


啗舌乳多說又形字九子



第六卷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金

木

月

天

地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錢玄同文集

书信

第六卷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玄同文集 (第六卷) 书信/钱玄同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300-03556-6/K·248

I. 钱…

II. 钱…

III. ①钱玄同-文集②书信-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6354 号

钱玄同文集

(第六卷)

书 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5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0 000

定价: 2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天兄：

现在要算账了。丁黄、徐、徐、徐、
与人的，都有请他吃饭一下，玉想！
里初六日，送上。要付他钱，列一

丁黄、徐、徐、徐、

徐、徐、徐、徐、徐、徐、

共十元也。

黄、徐、徐、徐、徐、徐、

健功先：

对于你做的数人舍怨了，我总不
有所表明。我明知这是半信半疑
的，但这句话实因我信，一定会引
起别人的抗议来，所以不得不像我
中人所地表明一下，伙乞鉴全
原，连气极了，连气极了。



序 一

张中行

我是钱玄同先生的不成器弟子。如此论定乃写实，不是客气。这实可以由两个方面说。我 1931 年考入北京大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记得入学之后就听钱先生讲中国音韵沿革，共一年，考两次，“照例”都“及格”，所以称为弟子不假。钱先生学识精深，体方面（用方面，加性格，表现为事功，另说）主要是小学（今日语言文字）、经学和史学，我忝列门墙，前期避难就易，后期攻乎异端，以致入宝山却空手而返，所以说是“不成器”。幸而祖传的株连之法还没扩张到学业，我之不成器也就不会有损于钱先生的日月之明。这是说，我还可以不因为有时想到钱先生而感到不安。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闭户高卧的心安竟难得维持，是不久之前，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等编《钱玄同文集》（六卷）完成，命我写一篇序文，怎么办？与北大红楼中的一些师辈比，钱先生著作不算多，更大的遗憾是散见各处，未集成书本。编为文

集出版当然是大好事。至于序文，最理想是由魏建功先生写，可惜魏先生也是早已归了道山。此外找通钱先生之学的，也许不难吧？编者的意思，最好还是老北大的，曾亲罄欬，执笔写，钱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安慰。老北大，听过讲课，现在还能执笔，我闭目想想，一阵凄凉之后，只好不退缩，答应写。可是未入门，不能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下笔？幸而学术方面，有不少介绍文章已经谈到，还有，几卷文集具在，目验必胜过耳食，我就无妨走间道，多说个人印象，以显示钱先生正襟危坐之外的一些值得写入青史的情况吧。

依昔年的时间顺序，由听课说起。其时钱先生是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兼职，名义是名誉教授。中国音韵沿革一周两课时，连续讲，钱先生很少请假，所以每周可以见到一次。印象呢，中等身材，偏于丰满，面部大而白净，眼也大而很近视。口才好，立着讲，总是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在大学（尤其北京大学）授课，重学而轻法（教学法），就我听过课的一些文史界名流说，多数是笔高口低，举顾颉刚先生的例，下笔千言，到课堂上讲就既不清楚又不流利。钱先生不然，用普通话讲，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练的讲稿。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胡先生名列钱先生之前，是因为有时加点风趣，能使学生破颜为笑。钱先生则总是郑重其事，与友朋间

或书札中的表现不同。这证明钱先生性格的重要一面是认真负责，上课堂，所传是师道，专由外表看就不得不偏于严肃。钱穆先生能讲话，有时还谈笑风生，可惜乡音太重，如说“黄河”，我们北方学生总以为是说“王五”。这也难怪，钱玄同先生是研究并动手制定“国音”的，身体力行，所以表现于讲课，连语音也是无懈可击的。

这样说，是不是在任何事上，钱先生都循规蹈矩呢？也不然。可以顺着听课往下说，是一学期末尾，课程结束，依例，要期考，先生出题，并监考，学生答题，两小时交卷；然后先生阅卷，评分，及格，学生一年得两学分。第一次考钱先生这门课，上课钟响后，钱先生走上讲台，仍抱着那个黑色皮书包，考卷和考题发下之后，他打开书包，拿出一叠什么，放在讲桌上，坐在桌前一面看一面写，永远不抬头。我打开考卷，看题四道，正考虑如何答，旁座一个同学小声说，好歹答三道就可以，反正钱先生不看。临近下课，都交了，果然看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注册科，放下就出来。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的特有作风，学校也就只好以特有应对，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盖一个，只要曾答卷就及格。当时，我的感觉是钱先生确是怪，后来才明白，这只是他为人或性格的锋芒小露，虽然可称为“独行”，却也是颇值得敬佩的。加细说，可敬佩之点还可以一分为二。其一，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所学是入

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在手头的。其二，这种看法，或扩大，不以流俗为然的看法，钱先生以外的人也会有，何以未表现为怪？在钱先生，我认为这是他为人之大节，值得加重说说。

中国流行的处世之道是乡愿式的，充其量也要内方外圆。内方是能够分辨是非，并有志取是而舍非。外圆呢，比如情意是十分，就只表现五分，甚至三两分，更甚至微笑而已。钱先生不是这样，而是情意十分，必表现为十二分。所谓十二分，比如他认为应该唾弃的，口说或笔写，理由和主张无保留，说清楚，是十分，他则必进一步，表现为鲜明加激烈，所以就成为十二分。在其时的北京大学红楼之内，随己意想、随己意说是家常便饭，不过已上升为最高学府的名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难得放弃温柔敦厚，其结果就于诚信之外，常常要包上一层含蓄或雅驯。在这方面，钱先生表现为只此一家，不要含蓄，不管雅驯不雅驯，在一般人喊喊喳喳的时候，他必大声呼喊。这时因为他的身份虽是儒，性格却是侠的，心有所想，不形于外就忍不住。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多次改名，如对故国有恋，就名“夏”，对古史有疑，就名“疑古”，云云。这样的性格，有些人囿于世故，也许评为过犹不及。我想，如果撇开世故而着眼世道，总当承认，像钱先生这样的人，可惜是太少了。

感到可惜，值得说说理由。很多人都知道，“五四”前后是

学术思想领域破旧立新的火热时期，参与其事的人不少，可视为冲锋陷阵的几位，其中有钱先生。这可以同样归诸性格。钱先生认真，对于是非的分辨，尤其知之后的行，常常至于固执的程度。其结果，比如表现于文字，就不是温文尔雅，而是锋芒毕露。主旨是鲜明的，痛恨旧的腐朽，欢迎设想的清新。为此而大声疾呼，钱先生是战士的姿态。战，主导的力量是自己的理性，不是上方颁布的什么指示。纵观历史，几千年来，我们头上顶着的是传统，是帝王，从而生活就只能是读《圣谕广训》，听指示，被压到不能活还要高呼万岁。这都是旧的腐朽，应该灭绝，换为清新。如何才能换？办法可以另说，但事总要由人办，也许就不得不冲锋陷阵吧？钱先生往矣，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因文而传，不带往地下。

由不带往地下就会联想到他的事功。事功的范围可大可小。大，如授业，如上段说的冲锋陷阵，等等，都应该算；小呢，我想可以指他费力最多的国语和汉字方面的研究、改革、制定等工作。在知与行间，钱先生表现为更重视行。可能就是因此，他虽然劝说鲁迅先生写点什么，他却几乎不写离开事而可以称为创作的文章。这是否也可以算作钱先生的优点呢？我的意思只能算特点，因为，如果同于周氏弟兄，可写可不写的也写，他就可以为后学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未能这样，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过于重视事功。重视，躬行，当然会有成就。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正音、注音、简化等，可以看作解放后文字改革工作的先声，也就是人虽早

已作古，遗产却是既丰富又有大用的。

大节大致说完，还想说说我用弟子之眼看到并感兴趣的。一种是为人，主要是与熟人交往，还有认真、固执的另一面，是放任而多有风趣。记得上学时期口耳相传，红楼中的名流聚会，座上只要有钱玄同，空气就会变严肃为轻松，安静为热闹。在这方面，钱先生常常表现为玩世不恭。举他的书札为例，魏建功先生保存不少，钱先生作古之后，魏先生编为《钱玄同先生遗墨》，影印出版。我有这本遗墨，一时找不到，幸而有魏先生赠的一封原信，还可以见到钱先生的流风遗韵。信是1931年暑假的末尾所写，封皮写魏先生全家，夫人王碧书也称先生，女儿魏乃称小先生，先生二字左侧都加偏旁“女”字。信里提到马四（马廉，字隅卿），用甲骨体，马字象形，四字画一只眼，外加方框，署名也作甲骨体，给人的印象是汉字中夹杂一些图画。图画是外貌，代表一种心情，是有机会破颜一笑就不放过。这夸大一些说是化苦为乐的人生之道，可惜就是在彼时，比如在师辈中，找钱先生这样的也大不易，何况生而为人，还可能住在没有笑甚至不许笑的社会中呢。每念及此，并想到钱先生，就不由得背诵《庄子·徐无鬼》篇的几句话，这是：“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另一种，由钱先生的书札手迹就想到他的书法造诣，也应该说说。其时红楼中的师辈（包括离开不久的），字几乎都写得不坏。如果必欲分等级，居上位的是沈尹默和马叙伦，所写

可以称为书家字。其次是黄节和沈兼士,有人也推为书法家。此外都可以称为学者字,自然也可以分高下,比如分为上下两类,钱先生当然要归入上一类。他笔下多隶意,有时很像六朝写经而兼有行书的流利。我手头有他手写影印的《说文部首今读》,恭整小楷而竟也带些隶意,劲、秀、美,可评为妙品。魏建功先生的法书与钱先生是一路,也是隶兼写经,也许竟是出于钱先生吧,到新北大,就成为燕园内首屈一指的书法家,此亦钱先生之遗泽也,只是年轻一代都不知道了。

我认为应该知道,所以编印钱先生遗著就成为必要——应该说“更”必要,因为,比如限于红楼时代以及其中的名流,有的已经编印了全集,有的尚未全,却在世时就出了不少单本,因而想读就不难找到。钱先生是罕见的例外,零零碎碎写的也不算少,在世时却未集为单本出版,逝世至今整整一个甲子,还未见有人辑为什么形式问世。所以听到刘思源先生等做辑印的工作,并已完成付排,我作为尚在食息人间的弟子,不只高兴,而且感激。刘先生在鲁迅博物馆做研究工作,有材料丰富的条件,而为人又勤于治学,认真负责,所以文集的内容能够巨细不遗,条理清晰。可以断定,问世之后,就不只是想读钱先生著作的人不再有困难,而且,比如研究五四前后的文化史,想了解多方面的破旧立新的情况,也就可以取得方便,省许多各处翻检的精力。

1999年1月30日于京华北郊

序 二

陈漱渝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

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鲁迅认为这八个字“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在清代文坛影响极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自有其文学成就，对其评价也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一流派的文论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当然成为推行白话文的敌人。“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自然跟五四时期“废孔学”、“祛驱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至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从唐初开始，就有了一门研治《文选》的专门学问——“文选学”，亦称“选学”。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尝试集〉序》）可见，钱玄同是

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由于钱玄同“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文章汪洋恣肆，态度激烈，守旧派因而对他恨之入骨。“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林纾在文言小说《荆生》中，用金心异这个人物影射钱玄同——金对钱，心对玄，异对同，幻想能有一个须眉伟然的“伟男子”能“取其眼镜而掷之”，使其“怕死如猬，泥首不已”。杜亚泉（伦父）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咒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为“魔鬼”，希望他们“速灭”。国学家黄侃贬斥钱玄同，说钱著《文字学音篇》是趁他撒尿时窃其笔记写成的。严复在致熊纯如信中也把钱玄同等人比喻为“春鸟秋虫”，以狂妄的态度宣称“听其自鸣自止可耳”。以上事例不仅暴露了五四时期旧营垒代表人物的专横和虚弱，同时也反衬出钱玄同等新文化先驱者震铄一时的丰采英姿。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以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学卷”中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他的文言散文得力于梁任公，“笔锋常带感情，发挥尽致，叶泻无余，而无一句含糊语”（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

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比如他在《语丝》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一文，祝贺“宣统皇帝”被逐出故宫，废除伪号，开始成为一个国民，并规劝他今后多读新书刊，补习些初中程度的科学知识，将来更可上外国去留学；最后还希望他正确对待婚姻问题，不要去看廿四史里的皇后外戚传。这篇文章通篇都是纯正的白话，文风幽默，剀切中理，表现出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强烈的民主意识。据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记载，1919年11月1日，天津“觉悟社”社员特邀钱玄同到天津就白话文问题发表谈话。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钱玄同当时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外数一数二的”；特别是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扶发中国的痼疾”。为约请鲁迅替《新青年》写稿，钱玄同常于下午四时来到绍兴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屁股生根。